

社会主义源流述评

马三才



丁戎 丁爱华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社会主义源流述评

马三才



丁 戎 丁爱华 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社会主义源流述评 / 丁戎, 丁爱华著. -- 天津 :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80688-772-1

I. ①社… II. ①丁… ②丁… III. ①社会主义 - 政
治思想史 - 研究 IV. ①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1040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 版 人: 项 新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网 址: www.tssap.com

印 刷: 天办行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0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卷首语

同任何思想、学说一样,社会主义思想和学说也有它的源和流。不过,这里所说的“源”和“流”,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专著中指称的:“物质的经济的事实”和“已有的思想材料”。按此思路追索社会主义运动繁复现象背后的本质并加以分析,对于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认识社会主义现在与未来的前景无疑是有助益的。据此信念,八年前笔者就开始醉心于相关材料的收集、阅读和疏理。通过这些基础性的资料工作,笔者的感知得到了提升,从而能够于近年按古今顺序将其归拢为十二章五十三节的不同内容,加上个人的一些分析和评判,终至集结成为这样一册篇幅不算太小的书籍。如果说从中可以看出笔者孜孜于学问有所斩获的话,那么,在如下几大问题的理解上似可见其端倪。

首先,社会主义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其思潮的源头,东方是以孔子(丘)为代表的儒家“大同”思想,西方则是古希腊柏拉图创作的《理想国》。由于孔子与柏拉图的学说分别在东西方社会生活中有着各自不同的巨大影响,所以在民众的心理意识、生活习俗、价值取向等多方面形成不容忽视的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这种差异形成的传统,不宜以优劣来论评,而应客观地加以分析,促进其优势互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对中国欺侮的日盛一日,为了救亡图存,觉悟了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学习西方,并把社会主义学说介绍到了中国。由于“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大同”思想便开始了与科学社会主义相“融合”的进程,这一进程中的具体成果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及其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90年的实践表明,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扎根的深浅如何,基本上取决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融合的程度。

其次,社会主义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核心部分,是人类社会未来(当今部分现实)的社会形态;坚持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坚持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由于“十月革命”成功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打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的预期,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遭遇到了一系列始料未及的挑战,整个社会主义运动为此而出现局部性

的反复、倒退,乃至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这样的大事变,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人类只会从中吸取到更加宝贵的经验教训,而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再次,如果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一对“孪生兄弟”的话,那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则是两个有“血缘”关系的“同胞姊妹”。资本主义本身含有社会主义因素,可能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在打造自身优势的同时,正逐步吸收资本主义已有的长处,创造有利于人的发展与解放必须有的物质基础,业已显露出比资本主义有更多优越性的前景。人为地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割开来、对立起来,以为它们是水火不容的对立关系,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

还有,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形形色色,种类繁多。惟有科学社会主义是属于马克思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脱胎于前苏联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不能不带有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某些烙印。有鉴于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并突出了“改革开放”的内容。改革为实践证明不适应时代发展变化的部分,以全面开放的胸襟吸纳资本主义社会的长处,从而使它与前苏联社会主义区别开来,实践中将更好地为创建人类理想社会——“自由人联合体”服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路走来虽然不是那么顺畅,但历经几番风雨,还是挺进到了“民富国强”的边沿。这得益于“改革开放”路径的正确,得益于“分步走”、先“小康”战略抉择的英明。当然,要达到真正的“民富国强”的境地,前面的路还很长,突破社会改革阶段的瓶颈尤为不易。但经历过“爬雪山过草地”的中国革命者,决不会因为面临艰难险阻而止步不前。

本书特点或优势,似可归纳为这样四点:①从世界全局着眼,按古今经纬度取材,连贯地就社会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进行探讨,不敢说“只此一家”,但至少在国内还比较少见。读者或可从中看出当今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②书中采用许多“大家”的观点,但绝非没有作者个人的见地;许多过时的观点和用语被基本清除,所见研究新的成果大多被采用;对标新立异的东西态度谨慎,为经验证实的史料则以新的视角评析。③它是一本“专史”。鉴于世界万物彼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探讨社会主义成长过程的同时,也顾及到了“通史”的发展轨迹。④文体采用理性表述与感性描绘相结合的样式,类似于所谓的“大散文”,叙事、抒情、议论交叉运用,这虽是史书惯用的文体,在避免文字沉闷或流于浮华方面有一定作用,但如能获得阅读习惯各有不同的读者诸君大致认可,也就是笔者的“三生有幸”了。

最后,套用阮次山先生一段广告词曰:评论不是结论。评论只是提供多一个看问题的角度与方式。

2010年11月19日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翹楚的憧憬	
——孔子的“大同世界”与柏拉图的《理想国》	(14)
第一节 孔子生平事迹与所处的时代背景	(14)
第二节 孔子“仁”的人生哲学思想	(19)
第三节 孔子的政治理想	(30)
第四节 柏拉图的经历及其理念	(38)
第二章 乌托邦社会主义	
——与资本主义对立的乌有之乡与福地乐土	(60)
第一节 资本主义在封建社会“胞胎”里孕育长成	(60)
第二节 资产阶级首先在英国确立了统治地位	(70)
第三节 乌托邦社会主义思想家及其理论的问世	(78)
第四节 乌托邦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特征	(81)
第三章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承上启下的贡献及其在大革命中的作用	(92)
第一节 18 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形成的社会条件	(92)
第二节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及其理念	(103)
第三节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与法国大革命	(110)
第四节 关于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	(114)
第四章 空想社会主义的顶峰	
——三位“天才”思想家及其后继者的创见	(120)
第一节 圣西门和他的学说	(121)
第二节 傅立叶和他的法郎吉式的和谐社会	(124)
第三节 欧文和他的劳动公社	(127)
第四节 工人运动(共产主义)的代表及其理论	(128)

第五节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及其论点	(133)
第五章 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学说的形成与恩格斯的贡献	(138)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物质的经济事实	(138)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42)
第三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事迹片断	(158)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	(166)
第六章 民主社会主义	
——伯恩施坦与第二国际的考茨基	(182)
第一节 民主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及其特征	(183)
第二节 民主社会主义组织——费边社及其主张	(187)
第三节 伯恩施坦和他的议会社会主义	(191)
第四节 考茨基的功过是非辨析	(199)
第五节 与民主社会主义相关的社会主义流派	(208)
第七章 苏联社会主义	
——“十月革命”的成功与列宁的经济政策	(218)
第一节 “十月革命”爆发前的俄国的内外形势	(218)
第二节 列宁的思想理论和他在“十月革命”前的活动	(226)
第三节 列宁在“十月革命”中作用	(237)
第四节 列宁经济建设思想和他的新经济政策	(243)
第八章 苏联社会主义	
——斯大林体制特征及其优势与弊端	(264)
第一节 斯大林权力扩张的曲折过程	(265)
第二节 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成因	(279)
第三节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功效	(289)
第四节 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	(292)
第五节 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总体评析	(296)
第九章 苏联社会主义	
——改革的偏颇与国家的没落	(300)
第一节 新形势下的旧做法	(300)
第二节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体制的冲击	(303)
第三节 勃列日涅夫的保守与倒退	(305)
第四节 戈尔巴乔夫放弃党的领导权的恶果	(309)
第五节 苏联解体的内外因素	(314)

第十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与对立	(323)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传播及其 与本土文化融合的产物	(323)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合作与对立	(337)
第三节 中共战略重心转移和国民党对中共的剿灭政策	(345)
第四节 国民党剿灭中共政策的破产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360)
第五节 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形成的抗日优势及其间的波折	(366)
第六节 国共两党的和谈与对决后的不同动向	(384)
第十一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毛泽东对中国建设道路的探索	(393)
第一节 是稳定新民主主义秩序还是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	(394)
第二节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412)
第三节 体制改革的努力和纠“左”转向后的调整	(426)
第四节 “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文化大革命”	(432)
第十二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与理论创新	(433)
第一节 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	(434)
第二节 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与尝试	(438)
第三节 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贡献	(452)
结 论	(458)

导 言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作为财产私有、少数人剥削和压迫多数人等不公现象的对立物,憧憬劳动者自由解放、过上公平和正义生活的社会主义思潮随之产生。当这种思潮日积月累到足够的量时,在一定的时空下就发生了质变。质变的表现,就是由当时思想文化界的翘楚对未来的理想社会,作出完全不同于现实世界的非常美妙的描绘。

两千多年前,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丘),面对子杀父、臣弑君——“礼崩乐坏”的社会乱局,依据先民对远古部落联盟(尧、舜)时代的传颂,构建出一个“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而且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样的社会情景,不仅意味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富足,而且精神层面的各种需求也得到应有的照料。

古希腊柏拉图痛心于内忧外患,写出了通篇谈论正义的《理想国》。他指出,“正义”是位居核心的政治美德,是构建理想国家的基础;只有正义使城邦(国家)至善,维持城邦秩序与和谐;统治者立法与统治必须以百姓的利益为依归,本阶层应该实行“共产共妻共子”制度,消除“你的”“我的”私有观念,才便于制止城邦分裂和衰败。

检视孔子和柏拉图勾勒的理想社会的画面,尽管存在着设计粗糙和实现途径虚无等不足,但由于它含有否定财产私人占有和社会财富为大众平等共享的因素,并且这种价值观念为早期社会主义者所吸收,以至《共产党宣言》也说:废除私有制是自己的主要诉求。所以,我们可以也应当把孔子和柏拉图对未来社会制度的思索,定性为萌芽或朦胧状态的社会主义意识。这种萌芽或朦胧状态社会主义意识的出现,既表明它是人类对阶级社会不满的产物,也足证企图匡正世事不公的社会主义源远流长。

鉴于柏拉图《理想国》晚于孔子“大同世界”构想 100 余年,可以断言,社会主义思潮最初萌芽或朦胧出现之地,与其说是地处欧洲的希腊,不如说是位于地

球东端的中国更符史实。

当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一种真正意义上否定资本主义理论的出现,通常都从16世纪初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刊行问世时起算。

乌托邦构想之所以在这个时候出现,基本原因在于资本原始积累和家庭手工业生产发展阶段,资产者与封建贵族联手对下层民众掠夺和压榨特别的残酷。

自《乌托邦》刊行问世起,空想社会主义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即与资本原始积累和家庭手工业相适应的,政治上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萌芽时期的社会主义学说;与工厂手工业生产相适应的,政治上属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主义学说;与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相适应的,政治上是资产阶级统治时期的社会主义学说;再就是与大机器工业生产相适应的,政治上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走向成熟的19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有了科学内涵的社会主义学说。在回顾这一历史进程时,恩格斯写道:

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发动,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16世纪和17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空想的社会描写,而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该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本身。禁欲主义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种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

圣西门等人和启蒙学者一样,锁定目标不是首先解放某个阶级,而是要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只不过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在他们看来,按照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和非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一切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弃到垃圾堆里去。

空想社会主义最大贡献,在于他们在全盘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对理想社会模式的构想越来越趋于完美和可信。正因为有了他们无情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奇思妙想,才使得以打碎资本主义旧世界、建立无产阶级新秩序为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诞生有了必要的思想条件。恩格斯特别指出,科学社会主义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确立起来的。

1831年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1838-1842年英国宪章运动达到了高潮。这样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促使人们对以往人类历史作一翻新的研究,结果由马克思发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作了这样的表述:

以往的全部历史(原始状态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相互斗争的

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由法的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念形式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结底都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

对此,恩格斯概括说: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①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发现了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秘密。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恩格斯说,“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②

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在三个方面:

第一,空想社会主义者以为,社会主义是“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产物。

第二,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个坏东西,应该彻底抛弃;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打下了物质基础,是社会主义实现必须有的前提条件。

第三,科学社会主义认为,资产阶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培养出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现实力量。而在空想社会主义者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一百多年来的实践表明,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固然并非天衣无缝或“绝对真理”,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它的诞生和传播,打碎资产阶级旧世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新秩序的诉求迅即转变为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

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次尝试。虽然它的存活仅只 70 余天,但它所创造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而为人所称颂”。巴黎公社失败后,欧洲工人运动的重心从法国转移到了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成功地利用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普选权,博得了超过总数四分之一选民的支持,这不仅迫使统治者废弃了反社会党人法,而且为整个欧洲工人阶级政党如何利用普选权做出了榜样。

1889 年 7 月,第二国际在法国巴黎成立。来自德、英、俄等 19 个国家的社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739 页。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第 2 版,第 740 页。

社会主义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这些资本主义敌人,在资本主义狂欢的阴影下集会,他们宣布:

我们的目标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废除雇佣劳动,创造一个不论性别和国籍的男女一律平等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能享受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

在签名者中,有来自德国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还有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年老的恩格斯等。

与会代表除一致同意“五一”为工人的节日外,还指出:战争是当前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当资本主义秩序本身消灭之后,战争将永远消失,工人阶级就会获得解放,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大会号召,在资本主义取得政治统治的国家,如果工人们已经取得选举权,就应该参加社会主义政党并推选他们执政。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工人们应该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获得普选权。

此后,直至1914年之前,“在欧洲大陆,可以说社会主义被马克思主义所俘获。到了世纪之交,马克思主义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宰。”^①

社会主义在这时所以取得独尊地位,主要归功于考茨基、倍倍尔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剥削理论(剩余价值学说)和历史理论(社会发展阶段的连续性,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卓越处理;得益于1873—1893年经济危机引起对资本主义气数已尽的命运预测。

191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获得34.8%的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1914年,瑞典社会民主党获得了36.4%的选票;从1917年10月起,它多次执掌政权,在1932—1938年间,为二战后西欧现代社会民主主义观念(劳资妥协、福利国家和充分就业)奠定了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无产阶级内部出现了分歧。恩格斯遗嘱执行人之一的伯恩施坦,对恩格斯另一个遗嘱执行人考茨基所持的与马克思主义紧密相连的两个学说观点——“崩溃理论”和“贫困化理论”提出了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可以避免危机”的新阶段;议会民主的发展使工人阶级能够在合法的、平等的条件下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可以在现有的国家体制内获得国家政权;社会中间阶层的发展,有稳定社会的功能的作用,而不是社会迅速的两极分化。他的一个著名论点是:目标是什么,对我来说毫无意义,运动就是一切。因此,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其进行了猛烈的反击。伯恩施坦为此而获得了“修正主义”的桂冠。

在1914年之前,如果说导致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主要的战略争论,是集中

^① [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上册,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在如何处理运动的当前任务和长远目标之间关系问题上的话,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是支持这场战争还是反对这场战争,就成了社会主义运动分裂的主要标志点了。原来,在1907年的第二国际斯图加特大会上,绝大多数成员党都承诺要竭尽全力阻止战争爆发。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就利用战争造成的危机进行社会革命。可是,当战争真的爆发的时候,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领头雁——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团却投票支持德国皇帝及其战争表决案。

如此一来,战争将德国社会民主党一分为二。各国社会主义者按对战争的态度再分为三派:支持本国参战的所谓“爱国的社会主义者”;中间的或和平的社会主义者;主张将战争变成革命机会的革命社会主义者。

社会主义运动分裂后的三个派别,后来几经分化、重组,以考茨基和伯恩斯坦为首的中间派,成为欧洲社会党走议会道路上台执政而奉行社会民主主义(改良主义)政策的精神领袖;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多数派则以面包、土地与和平的口号征得了人心,从而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作者萨松说,自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上台执政的路径不同来说,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两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一种,是在欧洲资本主义框架内通过合法选举上台执政的改良型的社会主义;再一种,就是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发展型的社会主义。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列宁是暴力革命的“忠实”支持者呢?不。萨松说,第一,列宁“从没主张将暴力革命视为原则的东西或任何时候都要实施”;第二,“在1914年以前,由考茨基代表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几乎没什么区别”。“有关1914年前列宁和考茨基就已经分裂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共产国际官方历史学家的杜撰。”^①

本来,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期,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结果;无产阶级世界性革命,即使不能在一切实文明国家里同时发生,至少也要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胜利才有可能。

但是,马克思对世界革命的这一预期并没有实现。尤其令世人感到惊讶的是,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没有在一切实或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而且出乎预料地在缺乏资本主义基础的一个国家——俄国发生了,并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建立了苏维埃国家政权。

这一意外的特殊情况的出现,对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比资本主

^① [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姜辉,于海青,庞晓明译)上册,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义更加雄厚物质基础之上的断言提出了挑战:既然资本主义生产力还大有发展余地、甚至它还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时候就可以将其“外壳”打破,那么,不是由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结果产生的社会主义,似乎也有立足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可能。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列宁主导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

这种政策试图通过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垄断,把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制度建立起来。可是,这项政策措施,在短时间内发挥出效率之后,随着外部压力的缓解,以及有限资源的快速消耗,它在社会实践中遭到了严重的失败:生产力衰退,耕地面积减少,工业生产下降,产品大幅缩水,国家经济陷入了危机,农民公然露出了反相。

在事实无情的教育之下,列宁作了认真的反思与检讨。他说,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①

列宁纠正错误的具体行动,是力主推行他那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新经济政策的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我们认为,在于着眼点和着力点都是从原来激进的立场上后退,退到与广大民众比肩而立的位置,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建立起可靠的联盟;以人们的基本需求为决策依据,对资产者和资本主义实行政策性的宽容,不仅用赎买政策把资产阶级专家请回来主持企业的管理,而且允许资产者从事经营活动和资本主义经济的生长。

正因为列宁从碰壁中把握住了民众的所思所想,毅然地把政策调回到以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出发点,在取消余粮征集制的同时,运用资本主义经验发展城市经济,所以能够使党和国家迅速摆脱当时出现的困境。

列宁逝世以后,围绕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的问题,苏共领导层进行了几次大的争论,最后斯大林的主张占了上风。1927年底,在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要求的指责下,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被全面废止。苏联社会主义走上了一条以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经济活动全部纳入计划、全面排斥和坚决反对资本主义介入为特征的发展道路,从而构建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所谓“斯大林模式”。

“斯大林模式”在实践中的突出表现,就是党政权力高度集中,领袖个人意志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宰;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以消灭富农作为建立农村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主要方式;而为国家强大优先发展重工业,则以牺牲和剥夺农民为代价;为了这套政策的施行,又不得不以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阶级斗争越尖锐的理论为指导,把心怀不满或不同政见者当成“反革命”加以镇压等等。这固然

^① 关志钢等:《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当代反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166页。

有斯大林个人品格方面的原因,但主要的还在于当时国内外形势紧迫以及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使然。倘若不是那么快地实现了国家工业化,没有内部意志高度的集中统一,很难想象卫国战争会取得那样辉煌的胜利,更不要说苏联会被打造成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

当然,斯大林模式在初期建设和战时表现出来的高速度、高效率,是与亿万苏联民众的爱国激情以及他们对外敌强加的困苦与牺牲的巨大忍耐分不开的。正因如此,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弊端虽然明显,但是由于它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完全可以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改革来加以克服,使之逐步地回归到确保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的科学社会主义。

可惜的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领导的继任者们,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从勃列日涅夫到戈尔巴乔夫,历任的共产党总书记,明知斯大林体制难以为继、民众“望改”弥殷,却一无例外地把改革当儿戏。既无完整的改革规划,更无意凝聚党内外共识,一面攻击和否定斯大林,一面又在权力集中、迷信个人意志、排斥市场经济等方面步斯大林的后尘。一场涉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社会变革,却有意无意地变成了总书记个人即兴表演的独角戏。8·19事件参加者之一的亚佐夫(国防部长)说,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叫的震天价响,“许多人却不知改革为何物”。正因为“改革”的感情用事多于冷静的思索,几十年的岁月流逝,国家领导人陷入了后任否定前任的怪圈。斯大林留下的弊端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民众的幸福指数未见实质性的提升。国内外不满的警钟一再敲响,亡羊补牢的时机一误再误。最后,由戈尔巴乔夫打开了民主化的“潘多拉盒子”,从宪法上勾掉了共产党的执政权,正式敲响了苏联国破党亡的丧钟。

当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悲剧正式上演的时候,西方世界一片欢呼。一些人认为:这不仅是自由市场经济对计划经济的胜利,而且意味着世界共产主义的就此终结。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以俄为师”的中国,不仅经受住了1989年“政治风波”的考验,而且乘着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东风,快速发展,在短短十余年时间内竟成了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

美国《新闻周刊》网站的文章《恐怖时代已经过去》说:“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特点似乎很明显。‘9·11’^①之后,每个人都可以看到我们生活在恐怖时代。”

“然而,在我看来,影响这个十年的实际是相当不同的事件,一个不那么危险,不那么耸人听闻,却在长远看来重要得多的事件——中国的崛起。”

“当然,恐怖主义是个问题。”文章接着说。但是,“这个十年真正的大事是中国从第三世界国家崛起为地球上第二大重要国家。1990年,中国遇到了麻

① 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驾机撞击纽约世贸大楼,造成近3000人死亡。

烦。当时它还是一个十足的第三世界国家,每天的人均收入不到1美元。它的大部分改革进行了10年,虽有进展,却速度很慢。中国进入冰冻期。解冻期是在邓小平(1992年)南巡时到来。邓宣布经济改革将继续。”

“在这十年中,中国经济以每年大约10%速度增长。累计起来,这使它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4.8万亿美元。到明年(2010年)中国将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不管以什么为标准,中国的成就的规模都是非凡的。它工业化的速度是西方的3倍,欧洲用100年实现的成就,中国只用一代人就实现了。在应对这样大规模的转变时,真正令人吃惊的是没有出现大规模动乱。”

“中国不仅安然渡过了金融危机,而且在危机中兴旺繁荣。中国经济增速今年将达8.5%,出口已恢复到2008年初的水平,外汇储备达到2.3万亿美元的新高。”

“这样的结果是,世界舞台上崛起一个新的大国,而且它在所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①

这位美国作者说的是事实,但他并不知道或不太清楚产生这些事实的背景或基础。另外一些有学养和有见地人则于惊诧的同时,着力探究中国快速发展的体制方面的缘由。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先生,在《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一文里指出,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所以取得如此非凡的成就,根本点在于国家政治经济制度的创新。用郑先生自己的话来表述,就是在这30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创造出了具有挑战美国价值观、发展中国家可资借鉴、对自身发展有深远影响的新的发展模式”。郑先生强调说:“中国模式尽管指的是改革开放的经验,但也应当看到,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就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前30年的发展经历了一些曲折,但也为后30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60年。”

在这篇文章里,郑先生从中国大历史角度对清末至改革开放前近80年历史,作了非常简洁而睿智的描述。他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革命领袖们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一个国家一直处于长期的探索之中,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只能在实践中进行。继续革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30年共和国历史的主要线索。”

郑先生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的主要成就是为一个主权国家独立奠定了基

① [美]法里德·扎卡里亚:《恐怖时代已经过去》,2009年11月12日《参考消息》第8版。

础结构。他说：“如果没有前30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很难有后30年的建设成就。”尽管改革开放的30年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不算什么，“但把它置于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人们会感觉到这30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30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因素。”^①

郑永年先生提出的所谓“中国模式”，其实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了建立这样的社会主义，中国人确实经历了长期而又艰难的探索。

近代以来，尤其自英国工业革命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的扩张，欧洲社会主义学说也向世界各地传播。与此同时，中国孔子的“大同”思想，在西方列强入侵和清室腐败无能的双重压迫下，又一次与农民起义（太平天国）相结合；在充当封建王朝更替工具未果、破坏更为惊心之后，人们特别是受到西学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隐约间感觉到了先师孔子构建的这一宏大理想的缺陷，在于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它安身立命的基础。祖训不能丢，缺陷要弥补。于是，他们迈出的第一步是试图学习英国，把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度当作是“大同”世界的复活。戊戌变法维新失败后，康有为逃身国外，在坚持“托古改制”理念的同时，苦苦思索近20年，完成了旨在把本土意识与西方空想社会主义糅合起来《大同书》的写作。他期盼国人以他的《大同书》为蓝本，把中国打造成如英美等那样的强国。难能可贵的是，他流亡海外对英美等国的实地考察后，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大同”世界。“大同”世界应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后。

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前20年，欧洲社会主义开始与中国传统文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统一或融合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梁启超功不可没。他写出《保教非所以尊孔论》的宏文，毅然与“保皇党”决裂。而对社会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统一或融合贡献卓著者，当数革命派领袖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是把孔子“大同”理念与科学社会主义等同起来的第一人。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就是当下的社会主义”。他多次强调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大同主义。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为防止资本主义弊病，他在“民生主义”中特地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重要思想。所谓“平均地权”，实际就是“土地国有”；“节制资本”，用孙中山本人的话说：“具体办法便是实行集体社会主义，使国家掌握一切大实业，如铁路、电气、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

孙中山“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产生，意味着中国的“大同”思想

① [新加坡]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新华文摘》2009年第23期，第23～24页。